

苦難的去責任化——〈東南苦行山〉的 歷史情感與跨語境再生產

李林杰

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摘要

本文以〈東南苦行山〉的跨語境傳播為切入點，探討歷史苦難如何在不同政治主體之間被重構與再生產。本文首先梳理藍統情感從行動型、過渡型到守望型的歷史演化，指出該歌曲生成於正統型苦難向存在型苦難轉化的臨界階段。在此基礎上，提出「責任型—正統型—存在型—工具型」4種苦難類型，強調苦難並無固定不移的本質意義，而是在不同語境中被各方競爭性編碼。進一步，本文構建「去政治化—審美化—再嵌入」的機制框架，解釋歷史情感如何脫離原有責任結構，轉化為可感的情緒形式，並在新的社會情境中獲得再生。案例分析表明，〈東南苦行山〉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語境中流行，正是由於其停留在存在型苦難層面，從而避開責任與工具兩種更具衝突性的結構。最後，本文指出，苦難的去責任化雖有助於降低對立、拓展想像空間，但並不自動轉化為政治整合，其效果仍受代際、認同與制度因素制約。為補強經驗基礎，本文並以1986年錄音版本、歌詞敘事單元及2023-25年中國影音平台可見樣本為材料，呈現作品由「遷徙—守持—返歸」的原始敘事，轉為懷舊、混剪與日常情緒投射的再編碼。本文進一步將「歷史苦難」界定為，可辨識的傷害事件經由群體承認、敘事傳遞與規範評價，轉化為跨越直接經驗者而持續生效的集體意義結構；其是否成為苦難具有最低辨識條件，但其責任歸屬、身份功能與行動方向仍由當下社會框架所塑造。

關鍵詞：歷史苦難；去政治化；情感再生產；跨語境傳播；社會框架

壹、導論

在當代跨語境傳播場域中，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正在浮現，某些原本深嵌於特定歷史苦難與政治情境的情感表達，正跨越其原生語境，被新的受眾重新啟用，實現情感再生產。其中，〈東南苦行山〉的再流行構成了一個典型且富有解釋價值的案例。這首歌曲最初生成於戰後台灣特定的政治情感結構之中，承載著「未完成歷史」的複雜心理經驗與守望心態；然而，在當下中國的傳播空間中，它卻獲得新的接受與情緒投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共鳴並不必然依賴受眾對原始歷史語境的充分認知，甚至可能顯著脫離其最初的政治指向。這一現象引出一個核心問題：為何一段屬於「歷史終結群體」的情感表達，能夠在另一社會群體中獲得新的生命力？進一步而言，歷史苦難所承載的意義，究竟是固定不變的，還是可以在不同社會主體之間被重新解釋與再生產？如果答案傾向於後者，那麼吾人必須追問，這種意義轉化是通過何種機制實現的？

既有研究為理解這一現象提供了重要基礎。集體記憶與記憶政治研究指出，歷史經驗並非對過去的被動複製，而是在社會框架、敘述慣例、制度安排與權力關係中被持續重構；文化記憶尤其依賴媒介、儀式與符號形式，才得以超越直接經驗世代而延續（Assmann, 2008; Wertsch & Roediger, 2008）。「情感轉向」則提醒吾人，情緒並非外在刺激之後才出現的私人反應，而是構成政治認同、群體邊界與國際互動的重要力量。情感可以決定何種歷史被感知為傷害、何種對象被理解為威脅，以及何種敘事被視為具有道德可信度（Wirth, 2020）。

然而，相關研究多聚焦於「記憶內容如何被塑造」或「情感如何影響政治行為」（Finney, 2014; Verovšek, 2016），相對忽略一個更基礎的問題，即歷史苦難本身的意義，如何在不同主體之間發生結構性分化與競爭性重構。換言之，吾人不僅要問一段過去被記成什麼，也要問它被編碼成何種類型的苦難，以及這種編碼如何改變其政治功能。本文旨在填補此一理論空白。其核心命題是，歷史苦難並不具備內在固定的政治意義，而是由不同政治主體在具體社會框架中，透過競爭性建構與動態機制不斷加以重構。本文

將苦難的意義結構劃分為四種理想類型，責任型、正統型、存在型與工具型苦難。這些類型並非靜態並列，而是在現實語境中相互競爭、疊加或轉化，對同一歷史經驗賦予不同的情感指向與政治內涵。跨國與跨語境記憶研究亦表明，記憶在移動中並非被原樣搬運，而會隨新的媒介、受眾與制度框架發生轉譯（Erll, 2026）。

〈東南苦行山〉的再度流行，為上述理論框架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經驗切入點。在其原生語境中，該作品屬於藍統情感的晚期形態，核心特徵在於從早期的行動導向轉向守望結構，呈現接近遺民意識的情感狀態。然而，在當代中國的傳播過程中，這種原本帶有歷史指涉的表達，被轉化為一種去責任、去方向的存在型苦難，因而能被不同背景的受眾接受、投射與共鳴。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用理論導向的個案研究與文本細讀。材料包括歌曲的關鍵意象與情感結構、其所處的戰後台灣政治，記憶脈絡，及跨語境傳播中可觀察到的再詮釋方式。本文不把單一文本當作對整體社會態度的統計代表，而將其視為一個機制展示型案例，用以追蹤歷史指涉如何被抽象化、情感形式如何被審美化，及新的受眾如何依據自身處境重新嵌入意義，此一處理與集體記憶研究對「敘事模板」和跨語境轉譯的關注相一致（Erll, 2026; Wertsch & Roediger, 2008）。

為提高個案分析的可檢驗性，本文補充 3 類經驗材料：（1）1986 年《雨中的歉意》專輯的曲目與創作資訊；（2）歌曲全篇的敘事結構與象徵意象；（3）*YouTube* 與 *bilibili* 上可辨識的上傳時間、版本標題、觀看量及二次創作鏈結（陳雲山，1986；殷正洋，1986、2012、2021、2023、2024、2025）。本文選擇〈東南苦行山〉並非因其可代表所有藍統群體或中國受眾，而是因其同時具備三項機制展示條件。原作具有可辨識的歷史主體與返歸方向；象徵語言又為脫離原義的情緒投射留下空間；數位平台上並存原唱、政治化字幕與去語境化改編版本。它因此構成一個「最可能觀察到意義轉化」的理論型個案。

分析單位分為兩層。第一層是原作的敘事單元，以主體位置、時間結構、空間意象、責任歸屬與行動方向 5 項問題進行文本細讀；本文所稱「文本細讀」，即不以單一詞語的印象判斷取代整體敘事，而是考察詞句在前後段

落、旋律反覆與象徵序列中的功能，再將其對應於 4 種苦難類型。第二層是平台版本，以標題、字幕、標籤、畫面素材、上傳時序及可見的再製關聯為觀察項目，用以判斷原始指涉被保留、弱化或重新政治化的方式。推論程序依序為，先由原始錄音與專輯資訊重建文本的生成脈絡；再以敘事單元辨識其原生政治功能；最後比較不同平台包裝，檢視意義如何跨語境移轉。歷史研究、文本分析與平台痕跡在此互為佐證，而非以觀看量替代受眾態度。本文未使用平台後台資料、代表性問卷或系統性訪談，因此對「流程度」「地域分布」僅提出有限判斷。

本文的貢獻有 3。第一，在理論上提出苦難的四種類型，強調歷史情感的意義並非內在固定，而是處於持續的競爭性建構與動態轉化之中。第二，在機制層面提出「去政治化—審美化—再嵌入」的分析鏈條，說明歷史苦難如何由政治化經驗轉為可遷移的情緒形式。第三，在經驗層面展示一種歷史終結型情感如何在新的不確定性語境中獲得再生。本文最終關注的不僅是一首歌曲的流行，而是當苦難不再指向明確責任與方向時，它將以何種形式繼續存在。

貳、歷史背景：藍統情感的演化

要理解〈東南苦行山〉的情感結構及其後續轉化，必須將其置於戰後台灣「藍統情感」的歷史演化脈絡中。所謂藍統情感，並非單一的意識形態立場，而是一種由戰敗與遷徙經驗、國家正統敘事、故土想像及統一目標共同交織而成的複合型情感結構。其歷史變化大體可以區分為行動型、過渡型與守望型 3 個階段。

一、行動型階段：復歸作為現實目標

在戰後初期至冷戰中期，藍統情感的主導形態可概括為「行動型」。此一階段的核心特徵在於，復歸大陸被視為具有現實可行性的政治目標；「反攻復國」不只是宣傳口號，也是一種由國家機器、教育與文化生產持續強化

的戰略預期。戰爭記憶與民族敘事在此被結合為一套面向未來的動員結構（Kushner, 2007; Ashplant, et al., 2000）。1949 年後隨政權遷台的群體承載著戰敗、流離與離散的創傷記憶，但這些經驗並未被表述為終結性的損失，而被重新詮釋為一段「尚未完成的歷史」。苦難的意義不在於承認終局，而在於證明復歸的正當性與繼續行動的必要性。情緒基調雖不乏悲情，卻仍以激昂、堅忍與使命感為主。從本文的類型框架來看，此一階段最接近工具型與正統型苦難的結合：苦難一方面被納入具體政治目標，另一方面用以維繫中華民國作為中國正統政權的歷史合法性。內戰雖在軍事地理上形成長期分隔，但在政治情感與認知層面仍處於「戰爭延長態」，因此苦難保有清晰的方向性。

二、過渡型階段：可能性的坍縮與敘事的延續

自 1970 年代起，隨著國際承認格局變化、兩岸長期分隔與台灣內部社會轉型，復歸大陸的現實可能性逐漸消退。原有政治目標雖仍被形式上保留，其現實基礎卻顯著削弱，因而在情感結構內部造成「信念尚存，而世界已變」的張力。台灣國家定位與共同體邊界的爭論，也逐漸由外部代表權轉入內部身份認同與民主正當性的競爭（Courmont, 2011）。一方面，官方及部分社會敘事仍堅持統一中國的歷史正當性；另一方面，社會成員在日常經驗中日益感受到其實現路徑趨於模糊。民主化與轉型正義議題又使國民黨統治史、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記憶進入新的責任框架，原有正統敘事因而不冉壟斷歷史解釋（吳乃德，2006; Shih & Chen, 2010）。在文化表達層面，行動與使命的語調逐漸讓位於抒情與懷舊。苦難不再只是動員資源，而開始內化為較私人化的失落、等待與無法返回。此一變化並未徹底剝離政治屬性，卻使藍統情感由強動員結構轉向弱動員結構，為後續守望型情感的形成奠定基礎。

三、守望型階段：從政治主體到歷史遺留物

冷戰結束後，尤其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加速之際，藍統情感逐步演化為一種「守望型」結構。信念本身可能並未完全消失，但已不再指向可操作的政治行動。「統一」仍可能作為象徵性目標存在，卻不再構成日常政治實踐的核心動力。懷舊在此既保存失去的世界，也暴露其不可復返性（Boym, 2001; Lin, 2022）。正是在這一語境中，〈東南苦行山〉一類文化表達得以浮現。其顯著特徵是，苦難不再被動員為行動資源，也不直接要求現實政治回應，而轉化為一種內在化的存在經驗。「苦行」意象體現了目的消失之後仍持續前行的情感狀態，其不再通向明確終點，而是在「無法抵達」的前提下維持自身。

此一階段的藍統情感由政治主體轉為歷史遺留物，其表達主要承載歷史餘緒。在苦難類型上，它仍屬正統型苦難，因為特定群體需要藉由歷史見證維持身份連續性；但其正當性已不再與具體行動直接掛鉤，而更像象徵性的堅持。台灣不同集體記憶典範的並存與衝突，亦使任何單一正統都難以重新取得排他地位（Wang, 2024）。進一步而言，守望型情感已接近存在型苦難的邊界。儘管仍留存特定歷史指涉，其表達卻逐步抽離明確的責任歸屬與行動目標，轉而呈現為更具普遍性的「不得歸」「不可達」與長期等待。正是這種邊界位置，使其具有被去政治化、審美化與再語境化的潛能。

四、階段轉化的結構性意義

綜上，藍統情感的演化並非簡單衰減，而是從行動導向的政治情感，轉為以維持歷史意義為核心的守望情感，最終趨近存在性體驗的結構性轉型。苦難的功能也由動員行動、證明身份，逐步轉向保存情感存在本身。此一轉型說明，情感會隨社會框架與政治可能性變化而調整；一旦原有目標失去可信的行動路徑，歷史敘事若要延續，便往往須改變自身的情感形式（Courmont, 2011; Wang, 2024）。〈東南苦行山〉因處於去行動化的晚期階段，其表達才得以脫離原有政治語境，被新的受眾以不同方式接收。

參、理論框架：苦難的四種類型

在關於歷史記憶與政治情感的研究中，苦難往往被視為一種客觀經驗事實，或作為集體記憶的核心內容加以討論。然而，苦難並不天然攜帶固定的政治意義；同一事件可以被不同主體詮釋為責任、正統、存在或動員的資源。本文因而將「歷史苦難」界定為，一段被集體敘事辨識為造成損失、剝奪、離散或尊嚴受損，並在後續社會框架中持續承載情感與規範意義的過去經驗。此一定義區分了作為事件的傷害與作為意義結構的苦難：前者具有歷史事實性，後者則隨記憶框架而變動。

本文區分 4 個彼此相關但不等同的層次。「過去」指已經發生而不能被完整復原的事件總體；「歷史」是依據證據、方法與論證對過去所作的知識重構；「記憶」則是個人與群體在當下社會關係中對過去進行選擇、組織與傳遞的方式。苦難既不是過去的全部，也不是記憶的同義詞，而是某些損失、暴力、離散或尊嚴受損被賦予負面情感與規範重量之後形成的經驗類別。集體記憶之所以能被持續召回，必須依賴群體提供的語言、分類與相關性框架；事件也只有在被公共敘事認定為傷害共同體時，才由個別痛苦轉化為文化層次的創傷或歷史苦難（Halbwachs, 1992; Alexander, et al., 2004）。

因此，本文對「歷史苦難」的定義包含 3 項最低條件：第一，存在可指認的生命、財產、歸屬、自由或尊嚴損失；第二，某一群體透過敘事、紀念、教育或文化作品將其辨識為具有共同意義的傷害；第三，此一傷害超出直接經歷者，經由媒介與制度持續傳遞，並對後來者的身份、責任或未來想像產生規範效果。若只有事件而沒有公共承認，它仍可能是個人痛苦或被壓抑的傷害，卻尚未形成本文所說的「歷史苦難」；若僅有抽象悲情而無可追溯的過去指涉，則較接近一般的存在性苦痛。

此一定義與本文錨定之「歷史苦難沒有固定本質意義」並不矛盾。最低條件回答的是何種經驗可以進入分析範圍；後文 4 種類型回答的則是同一經驗在不同框架中被賦予何種政治功能。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可在轉型正義框架中被詮釋為責任型苦難；1949 年前後的戰敗、遷徙與離散，則可能在外省流亡敘事中呈現正統型或存在型苦難。換言之，判斷「是否為苦

難」與判斷「苦難意味著什麼」是兩個分析步驟（吳乃德，2006; Shih & Chen, 2010）。在此前提下，本文將苦難的意義結構劃分為四種理想類型。四種類型並非對現實事件的終極分類，而是對不同「意義生成機制」的抽象概括；在具體案例中，它們可以疊加、競爭、轉化與重組。

一、責任型苦難：歸責與道德結構的維持

責任型苦難以「歸責」為核心機制，其基本問題是：苦難由誰造成？它通過界定加害者、受害者、因果鏈條與補償義務，維繫具有強烈道德指向的歷史解釋框架。國家暴力的供述、真相揭露與轉型正義爭論，都顯示苦難敘事很難脫離責任分配（Payne, 2008; 吳乃德，2006）。在此類型中，苦難不只是經驗，更是規範判斷的依據。它既劃定正義與不正義的界限，也為當下及未來的政治行動提供正當性。由於其結構依賴清晰的因果與責任邊界，一旦歸責被模糊，責任型苦難便會發生根本變化。其優勢是維持道德清晰與受害者能見度；其風險則是強化群體邊界，壓縮敘事和解空間。

二、正統型苦難：意義維持與歷史連續性

正統型苦難以「證明」為核心機制。其關注焦點未必是具體責任，而是借助苦難經驗證成某一群體在歷史進程中的正當地位與存續連續性。苦難在此成為歷史見證，用以回答「吾人是誰」及「吾人從何而來」。二二八記憶與台灣認同的關係表明，歷史傷害既可能支撐受害者正義，也可能進入不同政治共同體的正統敘事（Shih & Chen, 2010）。正統型苦難可以與直接行動適度脫鉤，但不能徹底失去歷史指涉。它常出現在「未完成的歷史」情境中。原定目標未能實現，敘事卻仍被延續；苦難的功能因而從推動歷史前進轉為維持歷史的意義解釋。當行動可能性繼續下降時，其歷史指涉逐漸弱化，情感表達向內在化和個人化移動，正統型遂可能轉向存在型。

三、存在型苦難：去指向化的情感經驗

存在型苦難以「去指向化」為核心機制，不再持續追問「誰造成苦難」，也不直接回答「應如何解決」，而主要作為一種可被感知、承受與投射的情緒經驗。其意義不再依賴宏大敘事或責任歸屬，而來自情緒強度與存在感。存在主義取向對苦難、真實性與生命意義的討論，說明苦難也可能被理解為人與限制、可能性及理想自我之間張力的構成部分 (Kaftanski & Hanson, 2022)。存在型苦難通常伴隨責任淡化與方向消失。歷史細節被抽象為離散、等待、不可抵達、長期忍耐等情緒形式，使其成為開放的投射容器。這種去指向化提高了可遷移性。不同群體無須共享同一歷史判斷，也可能因情緒結構相似而產生共鳴。其限制則在於政治效能下降，可提供情感安置，卻難以直接轉化為制度改革或集體行動 (Kleinman, 1986)。

四、工具型苦難：再導向與未來整合

工具型苦難以「再導向」為核心機制。它可以選擇性淡化責任或重新排列歷史細節，但必須把苦難嵌入面向未來的宏大敘事，例如國家建構、民族復興、政治整合或社會動員。戰爭紀念研究顯示，公共紀念往往不只是保存過去，也把犧牲轉化為面向未來的政治義務 (Ashplant, et al., 2000; Finney, 2014)。工具型苦難的關鍵是方向性。與存在型不同，它不能停留在情緒層面，而必須被納入行動敘事。其整合能力較強，但存在雙重張力：一方面需要保留情感真實性，另一方面又要控制解釋邊界，避免重新滑向責任型的對抗，或消散為存在型的開放。

五、類型關係：競爭性重構與動態轉化

上述四種類型共同構成一個動態的意義生成場域：不同主體圍繞同一歷史經驗，通過選擇性記憶、因果重排、象徵化與制度化，爭奪苦難的解釋權。記憶與歷史之間並非簡單的真偽對立，而是涉及何種材料被保留、何種

關係被突出，以及何種當下需要被投射到過去（Hutton, 2000）。類型轉化並無唯一線性路徑。當行動可能性下降時，正統型可能滑向存在型；當政治動員需求上升時，存在型可能被重新導向為工具型；責任型也可能經由淡化對抗而轉為正統型或工具型。教材、博物館與文化產品是此類詮釋競爭的重要媒介，因為它把抽象歷史框架轉化為可重複的日常敘述（Duan, 2023; Sakki, 2025）。

因此，本文的類型並非對苦難本質的終極劃分，而是分析其意義生成機制的工具。它使吾人得以區分：一段歷史何時要求歸責，何時證明正統，何時轉為存在感受，何時被重新導向未來（Wertsch & Roediger, 2008）。本文所稱「社會框架」不是籠統的時代背景，而是使某種過去得以被看見、命名、連結與使用的當下條件，包括國家制度與合法性敘事、教育和紀念體系、群體關係、代際位置、媒介技術及平台分類。哈布瓦赫（Halbwachs, 1992）指出，個人並非在社會之外自由回憶，而是借助群體提供的時間、空間與語言框架重構過去；因此，意義流轉並非記憶內容自行變形，而是框架改變後，某些元素獲得可見性，另一些元素失去相關性。

在本文的歷史分期中，行動型階段的框架由冷戰對峙、戒嚴體制、國家教育與流亡共同體所構成，因而突出復國使命、正統地位與未完成戰爭；過渡型階段的框架則由國際承認變化、民主化、本土化及轉型正義組成，使原有返歸敘事與新的責任追問相互競爭；守望型及數位再流通階段的框架，進一步加入代際距離、平台推薦、字幕包裝與混剪文化，使文本可以脫離完整歷史知識而以情緒形式被接收。三個階段不是單純的時間推移，而是制度、群體與媒介條件的重組。

肆、機制分析：去政治化與再生產

在提出 4 種理想類型之後，尚有一核心問題亟待回答：不同苦難類型如何實現轉化？本文認為，歷史苦難的跨語境移動可概括為 3 個相互銜接的階段：去政治化、審美化與再嵌入。3 者並非不可逆的直線，而是可以往復的機制鏈條。

一、去政治化：從責任結構到情緒殘留

去政治化指苦難在傳播過程中逐步脫離原生政治語境與責任結構，因果指向、規範判斷和行動訴求被弱化，僅留下較易移動的情緒餘韻。台灣白色恐怖的影像再現表明，文化文本可能保留壓迫的氛圍與受害形象，卻同時刪去令人尷尬的政治立場、組織關係與歷史複雜性（Lin, 2024）。此一過程主要通過兩條路徑實現。第一是認知層面的選擇性迴避。當歷史苦難牽涉高度爭議的責任結構時，新的受眾可能迴避深入的歷史判斷，轉而尋求較低認知成本的情緒體驗。第二是表達層面的抽象化。具體人物、事件與政治語彙逐漸淡化，「離散」「不得歸」「等待」「苦行」等普適性意象則被強化。經由上述雙重路徑，苦難可以由責任型或正統型轉入存在型的中間狀態。它不再指向清晰的加害者，也不承載具體政治訴求，而成為去指向化的情緒殘留。需要強調的是，去政治化不等於歷史自然消失，而是特定關係被有選擇地懸置，也意味著被懸置的責任在新的政治條件下仍可能重新出現。

二、審美化：從歷史經驗到情感形式

在去政治化基礎上，苦難進一步經由審美化，轉化為可感知、沉浸與反覆體驗的情感形態。審美化並非簡單美化苦難，而是使苦難獲得特定形式。音樂的旋律與節奏、文學的意象、影像的空間和視覺風格，皆可把複雜歷史壓縮成具有傳播力的情緒場景。媒介化的苦難因而同時具有觀看倫理與形式吸引力（Chouliaraki, 2006）。此一轉化帶來「歷史降維」與「情緒升格」的雙重運動。前者將複雜責任結構壓縮為較單純的情緒，降低受眾進入門檻；後者則把負面的傷害經驗轉為具有表達張力的審美對象。懷舊尤其擅長把已失去的政治世界重組為可凝視、可追憶的形式，使受眾即使不共享原始政治信念，也能分享其失落感（Boym, 2001）。由於審美形式不再完全錨定特定歷史語境，受眾得以依自身生命經驗進行再詮釋。生活挫折、身份焦慮、代際失落與未來不確定性，都可能被投射到同一情緒載體之中。此種開放性是文化文本跨越群體和世代邊界的重要條件。

三、再嵌入：情緒的跨語境遷移與意義重構

完成去政治化與審美化後，苦難並未停留在純粹情緒層面，而會進入新的社會語境，被新的主體重新詮釋。再嵌入的基礎並非歷史經驗完全相同，而是情緒結構具有可比性：長期不確定、目標與現實的張力、無法抵達的失落，以及在無望中持續忍耐，都可能促使受眾借用既有審美形式。再嵌入意味著原始歷史指涉被選擇性保留，新解釋則疊加其上（Erll, 2026; Kunze, 2024）。一段指向特定政治歷史的苦難表達，可以被重新理解為生活壓力、身份困境或存在境遇的隱喻。此一過程不是單純替代原義，而是意義重組：舊的情緒形式為新經驗提供語言，新受眾也反過來改變文本的公共含義。再嵌入不必然導致永久去政治化。當新的行動者把情緒重新整合進國家、民族或制度敘事時，存在型苦難可能轉為工具型；當歷史責任重新成為爭議焦點時，它也可能回到責任型或正統型。故再嵌入是一個開放過程，其路徑取決於社會框架、政治需求與媒介環境。

四、機制整合：苦難意義的動態循環

綜合而言，歷史苦難的跨語境傳播可以表述為：政治化經驗經由去政治化而鬆動責任邊界，再經審美化獲得可傳播形式，最後在新的社會框架中被再嵌入並生成新意義。三個環節相互依賴：沒有去政治化，文本難以跨越對立邊界；沒有審美化，情緒缺乏穩定載體；沒有再嵌入，傳播只是形式複製而非意義再生產（Sierp, 2014）。而社會框架對苦難類型的作用可分為 3 個環節。它首先決定哪些損失被公開承認，其次安排責任、身份與未來方向之間的關係，最後提供可被反覆傳播的媒介形式。故「去政治化—審美化—再嵌入」並非懸空的文本運動。去政治化發生於原有責任框架失去支配力之時，審美化依賴文化媒介將複雜歷史壓縮為可感形式，再嵌入則發生於新的群體與平台框架為其配置不同用途之時。這一鏈條亦可反向運作。新的政治事件可以重新激活被淡化的歷史責任，新的文化產品可以改變既有審美形式，新的制度框架則可能把開放情緒重新固定為單一敘事。因此，苦

難不是某一敘事的靜態附屬物，而是一個持續被爭奪與再利用的意義資源場（Ashplant, et al., 2000; Verovšek, 2016）。

伍、案例分析：〈東南苦行山〉的跨語境轉化

一、作品來源與歌詞敘事

作為經驗對象，〈東南苦行山〉由陳雲山作詞作曲、殷正洋演唱，收錄於 1986 年專輯《雨中的歉意》。其出現時間本身具有分析意義，既晚於 1950 至 1960 年代反攻敘事最具行動性的階段，又早於 1990 年代民主化、本土化與兩岸交流全面改寫政治語彙的時期，因而位於行動型情感衰退而守望型情感尚未完全私密化的歷史節點（陳雲山，1986；殷正洋，1986）。〈東南苦行山〉生成於藍統情感的晚期階段，其核心情感結構可以概括為「守望型正統」。統一作為歷史目標並未全然消散，但其現實路徑已高度模糊；情感表達由早期行動導向轉向維持歷史意義。在此結構中，苦難不再主要用於政治動員，而成為某一群體在歷史進程中位置的見證。此種由行動轉向懷舊與守望的變化，與當代台灣對日本殖民、戰後國家與不同中國想像的多重懷舊結構相互映照（Lin, 2022; Wang, 2024）。

在文本意象層面，「東南」「苦行」「山」構成高度象徵化的表達體系。「東南」提供方位與遙望感，既能保留故土和政治地理的隱約指涉，也不必明說具體邊界；「山」象徵阻隔、距離與不可逾越；「苦行」則把外在阻隔內化為長期自我承受的存在狀態。³三者結合，使政治歷史被壓縮為持續前行卻無法抵達的情緒結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意象並不直接敘述特定事件、政權責任或政策方案。它們保留歷史情感，卻降低了責任型苦難所要求的清晰因果；保留正統型苦難的餘韻，卻弱化了正統敘事的行動命令。因此，作品本身已處於正統型與存在型之間的邊界，其後續轉化並非由外部語境憑空創造，而是利用了文本內部既有的開放性。

為避免以零散詞句代替整體分析，本文將全曲按「遷徙—守持—返歸」

三個敘事單元加以摘要。開篇描寫一群由中原遷至東南島嶼、暫時棲身的人，將遷徙與流亡置於集體主體的起點；中段以風雨、守持與數十年歲月表現信念仍在而行動路徑日益延宕；結尾借 12 道光與中國山河的方位想像保留返歸方向。這一結構並非單純從行動型一路線性滑向存在型，而是在同一文本中疊置了遷徙創傷、正統維繫與返歸願望。開篇提供歷史主體，中段構成守望時間，結尾仍殘留工具型方向。正因其行動命令被象徵語言包裹，後來受眾才可抽離最後的政治指向，只保留長期等待與不可抵達的情緒（陳雲山，1986）。

表 1〈東南苦行山〉的敘事單元與苦難類型

敘事單元	文本內容摘要	原生政治功能	對應苦難類型
開篇：遷徙	由中原遷至東南島嶼並暫時安頓，建立流亡者的共同起點。	確立歷史主體，保存戰敗、離散與遷台的斷裂經驗。	正統型（兼具責任背景）
中段：守持	以風雨、長期等待與持續守望表現信念延續而行動延宕。	將直接行動轉為歷史見證，使未完成目標以情感形式延續。	正統型向存在型過渡
結尾：返歸	以十二道光的政治象徵及中國山河的空間想像維持返歸方向。	保存「未完成歷史」與未來行動的殘餘指向。	正統型與工具型疊加

二、數位傳播的時序、管道與二次創作

數位痕跡顯示，作品的再流行並非突然發生，而是由「早期影音存檔—平台再上傳—二次創作擴散」逐步形成。殷正洋（2012）上傳的抗戰勝利 65 週年音樂會版本，以及 2021 年再上傳版本，均累積數 10 萬次觀看，為後續跨平台搬運提供了穩定音源。中國平台上，2023 年 9 月的殷正洋原唱版本、2024 年 2 月的繁體字幕版本及 2025 年 10 月的中英字幕版本，分別呈現原曲保存、政治化標籤與跨語言包裝等不同方式；同一推薦頁面還

可見搖滾、純音樂、降調、混剪與戲仿等衍生版本，部分衍生內容的可見觀看量已達數十萬。這些材料顯示，作品在中國的再流行主要不是依靠傳統唱片再版或地域性口耳相傳，而是依靠影音平台上的搬運、字幕化、推薦關聯與再製（殷正洋，2012、2021、2023、2024、2025）。

本文所稱〈東南苦行山〉的「再流行」，應被更精確地理解為一種可觀察的再流通現象，而非已由代表性統計證成的全民流行。其經驗指標不是單一影片的觀看量，而是同一作品在多年、跨平台與多種包裝方式中反覆出現，並形成彼此連結的原唱存檔、字幕重製、政治敘事、懷舊合集與風格改編。當一首 1986 年的作品在數位環境中持續被重新命名、剪輯和分類時，所呈現的社會現象是，不同使用者可以把同一文本配置到不同公共語境（殷正洋，2012、2021、2023、2024、2025）。

表 2〈東南苦行山〉數位傳播的可觀察樣本

平台	上傳日期	版本／包裝方式	觀看量	分析意義
<i>You Tube</i>	2012/2/25	抗戰勝利 65 週年音樂會現場版	78.9 萬	早期數位存檔，提供穩定音源與完整演唱影像。
<i>You Tube</i>	2021/10/6	英文題名之音樂影片	73.5 萬	跨語言標題與海外平台再流通。
<i>bilibili</i>	2023/9/28	殷正洋原唱版本	7,139	原曲保存與懷舊音樂分類。
<i>bilibili</i>	2024/2/2	繁體中文字幕及統一敘事說明	1.1 萬	原曲被重新嵌入當代兩岸政治敘事。
<i>bilibili</i>	2025/10/17	中英雙語字幕及主題合集	2.2 萬	跨語言包裝並進入混剪、軍歌與懷舊內容網絡。

註：頁面觀看量為 2026 年 6 月 30 日可見近似值，會隨時間變動；其用途是呈現可見性與再製路徑，而非估計整體受眾規模。

第一種使用情境是檔案保存與懷舊聆聽。原唱、演唱會與老歌合集保留歌手、年代及完整曲目資訊，使作品首先作為戰後台灣流行音樂的文化遺產被重新看見。此類包裝未必要求受眾接受其原始政治指向，但也不主動抹除歷史來源，對應的是較弱的去政治化。第二種使用情境是政治性再嵌入。當影片標題加入「中國台灣民歌」、統一敘事或戰爭紀念等說明時，原作中的返歸方位與中國想像被重新置於前景，作品遂由守望型正統再次靠近工具型苦難。這說明跨語境傳播不必然削弱政治性；平台包裝也可以把被象徵化的方向重新固定為當下立場（殷正洋，2012、2023、2024、2025）。

當作品進入新的中國傳播語境時，第一個變化是歷史知識與政治背景不再構成理解前提。部分受眾未必熟悉其生成脈絡，卻可以直接感知旋律、語調與意象所呈現的失落、忍耐和不可抵達。歷史責任的缺席使接受者無須先選擇政治立場，便可進入情緒經驗；此一過程完成了責任與方向的進一步淡化。第二個變化是審美形式被置於前景。歌曲的情緒強度並不依賴完整敘事，而通過反覆、延宕與象徵性意象維持。受眾由此可以把原本屬於特定政治共同體的失落，理解為更一般的個人挫折、代際焦慮、社會壓力或未來不確定性。文化文本在此並非被動保存歷史，而是把創傷與記憶加工為可在不同生命經驗中被重新感受的形式（Wang, 2004; Chouliaraki, 2006）。第三個變化是再嵌入。當新的受眾在自身生活中感知長期壓力、目標與現實的張力，或對某種「彼岸」的模糊渴望時，便可能借用作品的情緒結構。「苦行」被理解為持續承受的生活狀態，「山」被理解為難以跨越的結構障礙，「東南」則由具體方位轉為遙遠理想或未來狀態的隱喻。共鳴的直接對象因而不是歷史事實本身，而是經過審美處理的情緒形式（Kunze, 2024; Erll, 2026）。

從苦難類型來看，此一跨語境傳播完成了由正統型向存在型的結構性躍遷。在原始語境中，苦難仍服務於歷史意義的維持與身份證明；在新的語境中，核心意義轉向情緒體驗本身。作品的特殊位置在於：它已顯著弱化責任歸屬，降低直接政治衝突，卻仍保留強烈情緒與審美張力。正是這種「去責任但未去情緒」的中間特徵，賦予其第二次生命。然而，此一轉化並非穩定的單向過程。存在型苦難因其開放性，可以被不同個體持續借用；也正因

如此，它隨時可能被新的主體重新整合為工具型苦難，納入面向未來的宏大敘事。若歷史責任與政治身份重新成為傳播焦點，作品也可能部分回歸正統型甚至責任型。這說明文化文本的意義不由原作者或原始語境永久壟斷，而在傳播中持續被重構。

三、地域範圍與「東南效應」的證據邊界

上述材料足以證明作品已進入中國可訪問的大型影音平台並產生多版本再製，但不足以回答它是否「普遍流傳於中國各地」或「主要集中於東南各省」。*bilibili* 公開頁面顯示的是全站觀看量與內容標籤，不提供觀眾省份、城市或 IP 分布；某些上傳者使用「福建」等標籤，只能說明內容包裝方式，不能作為福建、廣東或東南沿海受眾占比更高的證據。故本文不把地理鄰近視為已被證成的解釋變項。較穩妥的判斷是，作品已形成跨地域的網路可見性，而實際地域結構仍屬未知（殷正洋，2023、2024、2025）。因此需保持方法上的克制，本文並不主張所有中國受眾都以同一方式理解歌曲，也不把網路可見的共鳴直接等同於整體社會態度。案例的價值在於揭示一種可能機制，即當歷史指涉被弱化、情緒形式被放大，原本具有群體邊界的政治情感便可能取得跨語境可譯性。此一機制是否廣泛成立，仍需後續通過平台文本、訪談或受眾研究加以檢驗。

陸、討論：代際、認同與未來想像

〈東南苦行山〉的跨語境傳播被本文理解為去政治化、審美化與再嵌入共同形成的情感再生產機制。其效應不僅涉及文化流動，也觸及代際結構、認同框架與未來想像。以下分別討論三者。

一、代際更替：從經驗性記憶到敘述性記憶

歷史情感的強度與形態，始終與其承載方式相關。在直接經歷事件的世代中，苦難以身體經驗、家庭損失與日常實踐被深刻內化，具有高度具體性與情緒強度。隨時間推移，後續世代主要通過教育、媒體、家庭講述、紀念空間與文化產品接觸過去，歷史遂由親身經驗轉為敘述性和文化性記憶（Assmann, 2008; Erll, 2026）。這一轉變並不意味情感必然消失，而是其生成方式改變。直接經驗的減弱通常擴大再詮釋空間，使後續世代可以在不同社會框架中重新排列責任、身份與意義。教材爭議即表明，世代並非被動接收過去，而是在當下政治與教育制度中學習何者應被記住、何者構成傷害（Duan, 2023; Sakki, 2025）。就〈東南苦行山〉而言，代際距離降低了原始政治語境對理解的約束，卻增加其作為審美形式被重新使用的可能。其傳播能力因而不只是「遺忘」的結果，也來自記憶媒介的轉換。當事件性知識減弱，情緒模板反而可能更容易移動。

二、認同結構：情感接近與政治分離

去政治化過程往往選擇性放大文化相似與情緒共通，暫時擱置制度差異與政治分歧。此一選擇性凸顯使存在型苦難較容易跨越兩岸群體邊界。然而，一旦討論進入國家定位、歷史責任或制度選擇，被懸置的差異便重新浮現。故情感共鳴並不同於認同整合（Courmont, 2011; Wang, 2024）。台灣的二二八記憶、白色恐怖記憶與中華民國正統敘事，均顯示記憶可以同時服務和解與邊界建構。情感上的相互理解若缺乏對責任與制度差異的處理，可能停留在美學共鳴；但若過早要求其轉化為政治承諾，又可能破壞使共鳴成為可能的開放性（Shih & Chen, 2010; Lin, 2024）。因此，當前狀態可以概括為「情感層面的接近」與「認同層面的分離」並存。（Verovšek, 2016）存在型苦難在前者中發揮橋梁作用，責任型與工具型苦難則在後者中維持邊界。這種多層結構使情感流動與認同競爭形成持續張力。

三、未來想像：情感降溫與方向懸置

苦難的去責任化確實可能弱化歷史對立的強度。當文本不再直接指定加害者，其道德對抗性下降，不同群體便可能在較安全的話語空間中接觸彼此的失落與恐懼。從此角度看，去責任化是一種情感降溫機制，有助於拓展未來關係的想像空間。但去責任化同時帶來方向懸置。責任型苦難至少提供正義判準，工具型苦難至少提供行動目標；存在型苦難則可能只保留情緒而缺乏制度出口。若苦難被完全審美化，受害者的歷史位置與責任問題也可能被遮蔽。因此，情感降溫不應等同於取消歷史判斷，而應理解為重新安排對話次序（Payne, 2008; Lin, 2024; Łuszczkiewicz-Mendis, 202; Wirth, 2020）在兩岸語境中，國家情緒、身份傷害與地位焦慮仍可迅速把開放情緒重新政治化。中國官方與公共敘事中對台灣議題的憤怒、恐懼與受傷感，說明情感並不天然促成和解，而會依政治框架被導向不同對象。因此，〈東南苦行山〉所揭示的不是一條由共鳴通往整合的必然道路，而是一個短暫鬆動既有邊界的情感窗口。其價值在於證明政治情感可以被重新翻譯；其限制則在於，翻譯本身無法取代責任處理、制度協商與現實選擇。

柒、結論

本文以〈東南苦行山〉的跨語境傳播為切入點，圍繞歷史苦難如何被不同主體重構這一問題展開分析。通過梳理藍統情感由行動型、過渡型到守望型的演化，本文指出，苦難並非固定意義的容器，而是在不同社會框架中被持續詮釋的情感與政治資源。在理論層面，本文提出責任型、正統型、存在型與工具型四種理想類型。責任型以歸責和道德判斷為中心，正統型以身份連續與歷史證明為中心，存在型以去指向化的情緒經驗為中心，工具型則把苦難重新導向未來目標。四者並非封閉分類，而是在政治可能性、媒介形式與社會框架變動中相互轉化。在機制層面，本文提出「去政治化—審美化—再嵌入」的動態路徑。歷史苦難首先通過責任淡化與表達抽象化脫離原生政治語境，繼而由文化載體轉化為可感知的情緒形式，最後在新的社

會情境中被重新嵌入並獲得新意義。此一機制表明，歷史情感不是靜態保存，而是在流動與再生產中維持存在。在經驗層面，〈東南苦行山〉展示了正統型苦難向存在型苦難的轉化。作品原本承載藍統情感晚期的守望結構，在進入新的傳播語境後，歷史指涉被淡化，情緒結構被放大，因而突破原有群體邊界。然此種轉化不是單向終局。存在型苦難仍可能被重新整合為工具型，或在責任爭議重新出現時回到正統型與責任型。

本文的總體結論是，當苦難不再以追責為直接指向時，它並未消弭，而是以另一種形態持續存在。它可以由政治資源轉為個體可感知的情緒經驗，由宏大歷史敘事轉為可被反覆體驗的審美形式，並在新的語境中被再解釋與再利用。文化文本正是在此過程中連接歷史與現實，參與集體情感的再生產（Wang, 2004）。新增的文本與平台材料則使本文的理論判斷獲得兩層經驗支持。歌詞內部的三段敘事顯示正統型、工具型與存在型並非外加分類，而是可在同一文本中辨識的功能差異；數位平台的多版本再製則顯示，原始返歸方向在傳播中可以被保留、弱化、重寫或戲仿，從而形成不同程度的去政治化與再嵌入。這一機制既包含希望，也包含風險。去責任化可能降低對抗、創造情感接觸，卻不能自動帶來政治整合；審美化可能保存苦難，也可能遮蔽其責任；再嵌入可能拓展意義，也可能再次服務動員。未來研究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檢驗何種媒介和制度條件促成不同類型的轉化。

在此意義上，〈東南苦行山〉的再流行不只是一個文化現象，更是一個觀察歷史情感如何被重構與再生產的窗口。當苦難失去原有的單一指向時，它反而取得新的傳播能力；但它將通向理解、遺忘抑或新的政治化，仍取決於後來者如何重新賦予其責任與方向。

參考文獻

- 吳乃德，2006。〈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2 期，頁 1-34。
- 殷正洋，1986。《雨中的歉意》*Discogs* (<https://www.discogs.com/release/16776930-殷正洋-雨中的歉意>) (2026/6/30)
- 殷正洋，2012。〈東南苦行山〉(抗戰勝利 65 周年音樂會) *YouTube*，2 月 25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a79Tj2pyg>) (2026/6/30)
- 殷正洋，2021。〈東南苦行山—Struggling in the Southeast〉*YouTube*，10 月 6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A1OvUaoVuc>) (2026/6/30)
- 殷正洋，2023。〈东南苦行山〉*bilibili*，9 月 28 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8411176G/>) (2026/6/30)。
- 殷正洋，2024。〈東南苦行山〉*bilibili*，2 月 2 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m41197VD/>) (2026/6/30)。
- 殷正洋，2025。〈東南苦行山—Struggling in the Southeast〉*bilibili*，10 月 17 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J4bz7Exn/>) (2026/6/30)。
- 陳雲山，1986。〈東南苦行山〉殷正洋演唱，收於《雨中的歉意》(錄音專輯)。台灣：Sunrise。
- Alexander, Jeffrey C., Ron Eyerman, Bernhard Giesen, Neil J. Smelser, and Piotr Sztompka. 2004.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shplant, Timothy G., Graham Dawson, and Michael Roper, eds. 2000. *The Politics of War Memory and Commemo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Assmann, Jan. 2008.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in Astrid Erll, and Ansgar Nünning, eds.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pp. 109-18.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Boym, Svetlana. 2001.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 Chouliaraki, Lilie. 2006. *The Spectatorship of Suffering*. London: Sage.
- Courmont, Barthélémy. 2011. "Sovereignty, Democracy and Identity: Domestic Debates over the Definition of the Nation in Taiwan."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23, No. 4, pp. 503-19.
- Duan, Lei. 2023. "Contested Memories of the Past: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extbooks in Taiwan." *ASIA Network Exchange*, Vol. 28, No. 2, pp. 1-15.

- Erll, Astrid. 2026. "Transnational Memory."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Vol. 68, 102223 (DOI: 10.1016/j.copsyc.2025.102223).
- Finney, Patrick. 2014. "The Ubiquitous Presence of the Past? Collective Memory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36, No. 3, pp. 443-72.
-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utton, Patrick H. 2000. "Recent Scholarship on Memory and History." *History Teacher*, Vol. 33, No. 4, pp. 533-48.
- Kaftanski, Wojciech, and Jeffrey Hanson. 2022. "Suffering, Authenticity, and Meaning in Life: Toward an Integrated Conceptualization of Well-Be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 13, 1079032 (DOI: 10.3389/fpsyg.2022.1079032)
- Kleinman, Arthur. 1986. *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unze, Rui. 2024. "Homey Foods: Domesticating Memories of the Martial-Law Era in Taiwan's Heritage Tourism." *Memory Studies*, Vol. 17, No. 1, pp. 71-85.
- Kushner, Barak. 2007. "Nationality and Nostalgia: The Manipulation of Memory in Japan, Taiwan, and China since 1990."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9, No. 4, pp. 793-820.
- Lin, James. 2022. "Nostalgia for Japanese Colonialism: Historical Memory and Postcoloni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History Compass*, Vol. 20, No. 11, e12751 (DOI: 10.1111/hic3.12751)
- Lin, Min-tser. 2024. "De-Politicizing and Dis-Remembering the White Terror Through Gothic: The Grand Narrative and Embarrassed Politics of Collective Commemoration in the Movie Detention." *Manusya*, Vol. 27, No. 1, pp. 1-23.
- Łuszczkiewicz-Mendis, Antonina. 2025. "Anger, Fear, and Hurt: China's Emotional Responses to the Taiwan Issue." *Gdańskie Studia Azji Wschodniej*, No. 28, pp. 143-61.
- Payne, Leigh A. 2008. *Unsettling Accounts: Neither Truth nor Reconciliation in Confessions of State Violen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akki, Inari. 2025.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y Textbook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Vol. 65, 102073 (DOI: 10.1016/j.copsyc.2025.102073)
- Shih, Cheng-Feng, and Mumin Chen. 2010. "Taiwanese Identity and the Memories of 2-28: A Case for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Asian Perspective*, Vol. 34, No. 4, pp. 85-

113.

- Sierp, Aline. 2014. *History, Memory, and Trans-European Identity: Unifying Divisions*. London: Routledge.
- Verovšek, Peter J. 2016. "Collective Memory, Poli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The Politics of Memory as a Research Paradigm."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Vol. 4, No. 3, pp. 529-43.
- Wang, Ban. 2004. *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Horng-Luen. 2024. "Can We Live Together? Collective Memory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aiwan," in Samia Ferhat and A-Chin Hsiau, eds. *Les Liens de la Mémoire: Itinéraires Taïwanais*, pp. 61-89. Paris: Presses de l'Inalco.
- Wertsch, James V., and Henry L. Roediger III. 2008. "Collective Memory: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Memory*, Vol. 16, No. 3, pp. 318-26.
- Wirth, Christian. 2020. "Emotion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and the Problem of Solipsism in Sino-US South China Sea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4, No. 1, pp. 25-45.

When Suffering No Longer Points to Responsibility: The Depoliticiz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Affect, A Case Study of “Dongnan Kuxingshan”

Linjie Li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ross-contextual circulation of “Dongnan Kuxingshan” as an analytical entry point to examine how historical suffering is reconstructed and reproduced across political subjects. It first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Blue-camp emotional structures in Taiwan from an action-oriented phase to a transitional phase and finally to a watchful or residual phase, arguing that the song emerged at a critical juncture between legitimacy-oriented and existential suffering. The article develops a fourfold typology--accountability-oriented, legitimacy-oriented, existential, and instrumental suffering--and proposes a mechanism of depoliticization, aestheticization, and re-embedding. The case shows how the weakening of responsibility and action-oriented meanings allows an affective form to travel beyond its original context. Such depoliticization may reduce antagonism and enlarge the space of imagination, but it does not automatically produce political integration; its effects remain conditioned by generational chang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o strengthen the empirical basis, the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1986 recording, the song's narrative units, and observable samples on mainland Chinese video platforms from 2023 to 2025. These materials show a shift from an original migration--endurance--return narrative toward nostalgic, remixed, and everyday affective uses. The article further defines historical suffering as an identifiable harmful past transformed, through collective recognition, narrative transmission, and normative

evaluation, into an enduring structure of shared meaning. Its recognition has minimum conditions, while its attribution, identity function, and political direction remain contingent on present social frameworks.

Keywords: historical suffering, depoliticization, affective reproduction, cross-contextual circulation, social frameworks